

一個不可說的故事： 《寵兒》中的創傷敘述¹

◎許智偉

摘 要

本文以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解讀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說《寵兒》（*Beloved*）中「創傷」、「記憶」與「敘述」三者間的關係。本文首先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創傷與記憶的觀點，說明創傷影響記憶的形成，也連帶影響日後受創者對創傷記憶的敘述。佛洛伊德的理論證明受創者的創傷敘述與一般記憶敘述最大的不同，在於受創者對創傷記憶不願提起又說不清楚的態度。本文以創傷敘述的特性分析《寵兒》中複雜難解的敘述風格，並說明摩里森如何運用此特性，說出一個原本是不可說的創傷故事。最後並以赫曼（Judith Herman）對創傷治療的理論探討《寵兒》中創傷敘述與創傷治療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摩里森（Toni Morrison），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赫曼（Judith Herman），《寵兒》（*Beloved*），創傷（trauma），記憶（memory），創傷敘述（trauma narrative），創傷治療（trauma healing）

¹ 承蒙何文敬教授之斧正，使筆者在寫作與修改的過程中獲益良多，特此致謝。

《寵兒》² (*Beloved*, 1987) 是當代美國作家童妮·摩里森 (Toni Morrison) 的第五本小說。如同她的前四本小說,《寵兒》的主題延續了摩里森對美國黑人種族與性別議題的關注。不同的是,《寵兒》的故事發生在美國奴隸制度廢除之際,這是摩里森第一次直接處理美國黑人在奴隸制度中遭受白人虐待的歷史事實。³ 她藉著一群被解放的黑奴的回憶來呈現奴隸制度對美國黑人所造成的創傷 (trauma),⁴ 以及受創的黑人如何依靠家人與社群的扶持走出過去的陰霾,找尋新的生活。

摩里森寫作《寵兒》的動機要回溯到一九七四年,那時她還是藍燈出版社 (Random House) 的資深編輯。在編輯一本名為《黑人之書》(*The Black Book*) 的選集時,她找到一則一八五六年的報紙新聞,內容描述一位名叫瑪格麗特·迦諾 (Margaret Garner) 的女黑奴帶著她的小孩逃跑,他們從肯塔基州的農莊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Cincinnati)。當警察與迦諾的主人前來拘捕她們時,迦諾拒絕回去農莊,並用刀子割斷了自己小孩的喉嚨,原因是她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被主人抓回去,並在奴隸制度中成長,成為被奴役的對象。這則新聞帶給摩里森很大的震撼,因為迦諾受到奴隸制度的壓迫而割捨親情的方式帶給她極深的絕望感,這種絕望是「前所未有且極端深刻,以致於無法引發激情、也無法令人落淚」(Morrison 16)。這則報導從此留在摩里森心中,無法抹去。十三年後,摩里森終於將女黑奴迦諾的故事改編為《寵兒》並出版。

對原本居住在自由非洲的黑人而言,被強押到美國為奴是一連串惡夢的開始。在小說的扉頁,摩里森寫著「六千多萬」(Sixty Million and more) (1),指的就是黑人被白人從非洲載運到美國的過程中死亡的人數。奴隸制度剝奪了黑人的自由與尊嚴,失去了做為人所應有的主體性。他們除了遭受肉體與心理上的折磨,還得面對因為奴隸買賣而導致的家

² 本文中小說的作者姓名、小說名及小說中的人名中譯皆根據何文敬教授翻譯的《寵兒》。

³ 摩里森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她以前並不想處理有關奴隸制度的題材,直到她發現其實她對這段歷史毫無所知。她也提到多數美國人對奴隸制度的刻意遺忘:「黑人不願意記得,白人也不想記得,我是指,這是全國性的失憶」(Angelo 48)。

⁴ 奴隸制度對美國黑人所造成的傷害包括肉體與心理兩個層面,本文所指的創傷專指心理層面的創傷。

庭破碎，骨肉分離。這些殘酷的歷史事實都具體而微地呈現在《寵兒》的情節中，小說中的人物因為遭受奴隸制度的壓迫而不時出現痛苦、憤怒、羞恥、無奈、絕望等的受創情緒。許多學者就以創傷為出發點來研究《寵兒》。伯森（J. Brooks Bouson）寫了一本書專門討論摩里森小說中的創傷與羞恥。他認為摩里森將黑人的苦難化為文字，以小說的寫作「藝術化」（aestheticize）黑人族群的羞恥與創傷（18）。在討論《寵兒》的篇章中，伯森結合創傷與羞恥的相互作用，說明奴隸制度不僅使黑人感到羞辱與受創，更迫使黑人在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中內化了白人所賦予的種族歧視（131）。有些學者在討論《寵兒》時也將書中的創傷主題與種族議題相結合。史帕格（R. Clifton Spargo）將黑人在奴隸制度中所受的創傷與《寵兒》中的鬼魂相連結。他認為在《寵兒》中，柴特（Sethe）所居住的一二四號中纏繞不休的鬼魂代表著歷史中未解決的黑人創傷（123）。摩根斯坦（Naomi Morgenstern）認為摩里森寫作《寵兒》如同受創者在受創後的「重複強制」（repetition compulsion）行為，⁵ 都是以敘述做為對過往創傷的重新見證（testimony）。《寵兒》的創傷敘述（trauma narrative）帶領讀者重新經歷奴隸制度的殘酷，⁶ 開啟「新奴隸敘述」（neoslave narrative）的另一種可能（104-106）。⁷

《寵兒》中有關創傷的情節是本文將討論的重點。不過本文並不算以種族的意識型態立場去解釋《寵兒》中創傷的形成與影響，而是試圖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討《寵兒》中創傷與敘述之間的關係。創傷、記憶與敘述在《寵兒》中的相互作用與影響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的第一部份說明精神分析學派對創傷的定義，以及精神分析學派中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創傷與記憶的看法。本文以佛洛伊德的理論證明創傷記憶難以用語言再現的特性，以及創傷敘述與一般記憶的敘述有何不同。在第二部份以《寵兒》中的例子說明摩里森如何運用創傷敘述的特

⁵ 關於受創者「重複強制」的行為，本文的第三部份有較深入的探討。

⁶ 本文以「創傷敘述」一詞指稱受創者對於創傷記憶的敘述行為。

⁷ 「新奴隸敘述」是摩根斯坦引用貝爾（Bernard W. Bell）的說法，指稱一種「從奴役奔向自由，具有口述特性的現代敘述」（Bell 289）。

性，試著以小說人物與小說本身的敘述再現出不可說的創傷記憶。第三部份則闡述「創傷敘述」與「創傷癒合」之間的關係，分析小說中利用敘述治療創傷的可能性。本文將以創傷敘述不同於一般記憶敘述的特點來分析《寵兒》的敘述風格。將創傷敘述的獨特性與小說中「多音且破碎」的敘述互相貼合，互為映證。以創傷與敘述的關係說明摩里森如何說出一個不可說的故事。

創傷、記憶與敘述

1. 創傷的定義

《寵兒》的情節以女主角柴特殺嬰的秘密為主。小說的敘述開始於一八七三年，也就是柴特殺死小女嬰後的第十八年，她與女兒丹佛（Denver）居住的一二四號被小女嬰的鬼魂糾纏不休。她的婆婆寶貝薩格斯（Baby Suggs）在八年前過世，兩個兒子郝華德（Howard）與巴格勒（Buglar）也因不堪鬼魂騷擾而離家出走。這個情形持續到柴特的舊識保羅四（Paul D）來到一二四號，定居下來並趕走鬼魂，才使柴特與丹佛對新生活有了希望。不過一位自稱「寵兒」的神秘女子的出現卻讓主角們所渴望的新生活有了變化。小說的敘述不斷夾雜現在（一八七三年）與過去（主要是柴特與保羅四的回憶），並以不同人物的倒敘，破碎地拼湊出主角們經歷過的創傷與小女嬰死亡的真相。

在討論《寵兒》中的創傷與敘述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瞭解創傷、記憶與敘述之間的關係。根據拉普朗虛（J. Laplanche）與彭大歷斯（J. B. Pontalis）合編的《精神分析辭彙》（*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創傷」一詞「指稱穿透破壞的傷害」（535），原本是外科醫學的用語。精神分析沿用此一辭彙，「並將其中涉及的三個意義轉移到精神層面：劇烈的衝擊、穿透破壞、對整體組織造成的後果」（535）。上述關於創傷是「衝擊、穿透、破壞」的概念源自於佛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文中對於創傷形成的看法。⁸ 佛洛伊德認為人類的

⁸ 佛洛伊德對「創傷」一詞的概念隨著不同的時期而有所轉變。最早期的概念是指主體在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痛苦經驗，因為無法弭除而停留在精神內，此時佛洛伊德對創傷的概念類似於身體的創傷，著重在事件的刺激與精神的衝突上。在下一個時期，佛洛伊德對創傷

心理需要維持一種恆定的狀態，他稱之為「快感原則」(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0: 9)。為了維持快感原則的運作，人類的心理機制有一層類似昆蟲硬殼的保護層。這個保護層可以抵擋外來的刺激，維持恆定的心理狀態。創傷的形成起因於某些突然出現的巨大刺激，使人類的心理機制無法在短時間內反應，而且因為刺激過於巨大，導致心理機制的保護層被穿透，出現裂縫。佛洛伊德認為此類突然出現的巨大刺激具有「創傷性」(1920: 26-29)。它中斷了使人類心理狀態保持恆定的快感原則，也癱瘓了人類心理機制處理與轉化外來刺激的能力。此類巨大的刺激因為沒有被妥善地處理，會一直固著在人一生的精神歷史 (psychical history) 中，「後遺地」(après-coup) (拉普朗虛 37) 成為創傷。⁹

2. 創傷記憶與創傷敘述

普雷格 (Jeffrey Prager) 認為記憶是「一種工具，可以重建從意識中被遺忘或分離的事物」(134)。記憶的再現必須依靠語言的敘述，在敘述記憶的過程中，我們試圖用語言將原本分散的記憶做有系統的整理，並清楚地表達出來。賈內 (Pierre Janet) 認為一般記憶的敘述「基本上是一

的研究轉向於兒童在前青春期 (prepubertal life) 生活中可能出現的性創傷，他認為這是主體在成長歷史中最早遭遇的創傷，在這個時期佛洛伊德相信創傷的作用並非在事件發生的當時，而是後遺性地在青春期的第二場景因為相關事物而引發，他並確立主體以抑制 (repression) 做為對創傷記憶的防禦作用的概念。接下來的時期，佛洛伊德不再把前青春期的性創傷視為引發神經症 (neurosis) 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對戰爭神經症 (war neurosis) 的關注引起佛洛伊德對創傷與意外神經症 (accident neurosis) 的思考。他發表〈超越快感原則〉一文，重拾早期認為創傷是刺激與破壞的經濟論觀點，並強調人類心理因為受創而導致快感原則的停滯以及另一個超越快感原則的任務的出現。在最後一個時期，佛洛伊德又拋棄了之前對於創傷起因是外部刺激穿透人類心理保護層的看法，轉而強調創傷是來自內部欲力的刺激，他把重點放在自發性焦慮對人類心理狀態的影響。本文所援引的佛洛伊德對創傷的概念主要來自他在〈超越快感原則〉一文中對創傷形成與影響的看法。有關佛洛伊德對創傷的概念如何轉變的深入論述，詳見《精神分析辭彙》第 535-539 頁。

⁹ 佛洛伊德以德文「後遺的」(nachträglich) 一詞解釋時間的推移對記憶可能產生的影響。在《精神分析辭彙》中，拉普朗虛與彭大歷斯將「後遺的」翻譯為法文 après-coup 並詳細解釋其意義為「意識為依照其『計畫』(projet)，透過不斷的意義重塑來建構其過往」(37)。然而，「並非整個實際體驗會被重塑，而是只有某些在經歷時未能完全被整合入一個具義脈絡的事件會選擇性地受到重塑。創傷性事件便是這種體驗的典範」(38)。受創者在創傷事件發生的當時並不瞭解創傷正在形成，唯有在事後透過對創傷事件的追憶 (其中涉及創傷記憶的抑制與引發)，受創者才能瞭解事件具有的創傷性。所以創傷是後遺地被賦予意義，它必須經由時間醞釀才能成形。

種說故事的行為」(661)。創傷敘述則有所不同，在受創的當下，受創者空白的心理狀態對受創當時的記憶形成與日後的記憶敘述都有極大的影響。赫曼(Judith Herman)就指出「受創者可能經歷強烈的情緒，卻無法清楚記憶事件的經過」(34)。就算對創傷事件有所記憶，受創者對創傷敘述也持保留的態度。在佛洛伊德早期對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中，他發現與創傷有關的記憶會被病人「有意地從意識中抑制、禁止、封鎖」(1895: 10)。有關創傷的記憶所連結的都是令人感到難過、懊悔、甚至屈辱的經驗，這些經驗「在正常心理狀態下，會從病人的記憶中消失，或以極概括的方式存在」(1895: 9)。佛洛伊德認為，受創者不願因為回憶創傷而重新經歷不堪的過往，所以會選擇將創傷記憶壓抑在無意識(unconscious)之中。對受創者而言，創傷記憶不應該被喚起，它應該被抑制或遺忘。即使受創者被要求敘述創傷記憶，他／她對記憶的內容也會有所保留，避免提及創傷記憶的核心(通常是創傷發生時的關鍵場景)。

在《寵兒》中，柴特與保羅四在敘述各自的創傷時都有所保留，不願說出創傷記憶中最不堪的部份。柴特清楚交代她被「學校老師」(schoolteacher)鞭打且搶走奶水的過程，她也告訴保羅四屋裡的鬼魂是寵兒，不過她卻保留了自己殺死寵兒的事實。當她說道「後來『學校老師』找到我們，帶著警察和一把散彈槍衝進這裡——」時，敘述就中斷了。雖然敘述是被保羅四打斷，但柴特也無意接續被中斷的敘述(51)。保羅四對柴特提及他在甜蜜之家(Sweet Home)與逃亡過程中所受的虐待時也有所保留。因為對他而言，「再講下去可能會把他們推上無法回頭的境地。他把剩下的留在原處：在他胸口埋藏的煙草罐裡，而那胸口曾經存有一顆鮮紅的心。罐蓋已經鏽得打不開了。現在他不會在這位甜蜜而堅強的女人面前把它撬開，因為她要是聞到裡面的東西，就會讓他蒙羞」(87)。柴特與保羅四各自保留的是彼此創傷記憶中最隱密、最不堪的部份，也是創傷記憶的核心。小說中人物的創傷敘述符合上述佛洛伊德的抑制論(repression)：創傷的記憶是不可說的，因為敘述與創傷有關的記憶會讓人感到痛苦。

受創者一方面不願提起創傷的記憶，在另一方面，他／她也無法說清楚受創的感覺。當受創者試圖透過語言再現受創時的驚嚇與受創後的

痛苦，意符（signifier）與意旨（signified）之間的落差使完整的再現成為不可能。卡露絲（Cathy Caruth）指出「當創傷被化為敘述，……原本屬於創傷記憶的精確與力量會隨之消失」（420）。創傷敘述無法真正重現創傷經驗，也難以使旁人領會到底創傷事件帶給受創者多大的傷痛；摩根斯坦也認為「能夠被瞭解的創傷就不再具有創傷性」（104）。柴特曾試著要保羅四說出對過去創傷的感受，保羅四則告訴她：「我沒有把握能說得出來。我的意思是，能說得準確」（86）。對保羅四而言，就算他想說，受創的感覺也難以用語言準確地描述。當保羅四受寵兒所迫離開一二四號後，柴特、丹佛與寵兒開始活在以一二四號空間為象徵的創傷記憶中，她們排除了一二四號以外的世界，陷入並沉溺在這一家人共同擁有的創傷中無法自拔。這三個女人開始彼此傾訴過去的創傷帶給她們的痛苦，因此當史坦普·培德（Stamp Paid）因為內疚而重返一二四號時，他聽到屋子裡充滿了女人們交談的聲音。

他並不理解自己在走向門廊時所聽到的聲音。遠在藍石路上時，他認為自己聽到劈哩啪啦的急促聲音——響亮、急迫，由於同時講話，所以他分辨不出她們在說什麼或在對著誰說。那話語倒不完全是胡言亂語，也不是方言。然而語詞的順序有點問題，他拼了老命也無法描述或破解出來。他祇能辨識出我的一詞。其餘的都分辨不出來。不過他還是走了過去，走到台階時，那些聲音突然減弱到比耳語還低。這使他停下腳步。聲音變成斷斷續續的輕聲細語，好比一個女人自以為是獨自一個人，沒人在看她工作時所發出的自言自語：線沒穿進針眼時的噓聲；看見一隻好盤子上又有一個缺口時的一聲輕嘆；招呼母雞時的低沈、親切的口吻。一點也不可怕或嚇人。只是發生在女人與其瑣事之間的永恆私語。（203-204）

史坦普·培德聽到的「永恆私語」是柴特、丹佛與寵兒對各自受創感覺的敘述。因為受創的感覺無法用語言清楚再現，所以外人難以理解到底這三個女人在說些什麼。當史坦普·培德放棄進入一二四號的企圖

後，「在一二四號裡面，女人的思緒混雜在房子周圍的聲音中，那些聲音史坦普·培德能夠辨識卻無法破解，而那些思緒則無法訴說，也沒有說出來」(237)。¹⁰ 創傷敘述與一般記憶敘述最大的不同在於創傷敘述是要說出不可說的記憶。創傷的記憶令人難以啟齒，而受創的感覺又說不清楚。這兩種特性加起來就成為創傷不可說的原因。受創者對於創傷是既不想說、又說不清楚。

再現不可說的創傷

在全書的最後一章，當寵兒從一二四號消失，柴特與保羅四重拾新生活，故事的敘述告一段落時，小說中的第三人稱敘述者以一句「那不是一則可以流傳的故事」(327-328)，對整個故事做了簡單的結論。敘述者將這句話重複了三次，強調小說中有關創傷的故事難以流傳，同時也凸顯了創傷記憶難以用語言再現的特性。既然創傷是不可說的，那要如何將不可說的創傷記憶化為可被閱讀的小說？如何使小說中的人物敘述一個不可敘述的故事？要如何敘述才能再現被抑制的創傷記憶，也重現受創的感覺？小說的敘述如果只是平鋪直敘地呈現柴特或其他人物的受創經過，並無法使讀者貼近受創者的感覺（受創時的驚嚇與受創後的失落與痛苦），也難以引起讀者的共鳴。《寵兒》的成功之處在於將創傷敘述的特性融入小說的敘述中，使得小說人物與小說本身的敘述都近似受創者敘述創傷記憶的過程，這種敘述策略使不可說的創傷記憶得以再現，並帶領讀者貼近受創的感覺與創傷的本質。

1. 記憶的引發

要用語言再現不可說的創傷，必須先喚起被抑制的創傷記憶。受創者將不願回想的創傷經驗壓抑在無意識中。然而，佛洛伊德認為，在

¹⁰ 小說中緊接著史坦普·培德的離去就是三章各自屬於柴特、丹佛與寵兒的獨白。這三章獨白代表了三人對各自創傷感覺的敘述，也符合當史坦普·培德走上一二四號台階上時，他所聽到的獨白私語。這三人的獨白也說明了受創者對創傷感覺的敘述近似心情的獨白：它難以被體會也無法有溝通的效果。卡露絲明白指出創傷敘述「不是對任何人說話，病人[受創者]不是與他人應答；它是獨自一人的行為」(420)。小說中柴特與寵兒彼此間的創傷敘述的確無法達到相互溝通，進而撫平創傷的效果。關於創傷敘述與創傷癒合的關係在本文的第三部份會有較深入的討論。

無意識中「被抑制之物保持著向上的衝動，它努力地想回到意識之中」（1939: 95）。佛洛伊德指出，被抑制的記憶在某些條件下能回到意識之中，其中包括了意識中壓抑力量的減弱（譬如在睡夢中），或是受創者再度經歷與創傷記憶相類似的經驗（1939: 95）。此種被抑制物復返的過程類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許多文章中提到的「非自主性記憶」（involuntary memory）（238）。「非自主性記憶」一詞原先為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所提出。他將記憶區分為自主性記憶（voluntary memory）與非自主性記憶兩部份。班雅明將後者的概念做進一步的闡釋，並指出普魯斯特在寫作《追憶逝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時將自己關在房間中，以類似做白日夢的方式寫作，其目的是以非自主性記憶將現在的經驗與過去的記憶相連結，進而喚起原本被抑制的記憶（239）。在另一段論普魯斯特的講詞中，班雅明指出「非自主性記憶並不是呼之即來的，……這些在我們生命經驗的暗房中逐漸顯影的圖像是我們能看到的圖像中最重要」（Hansen 179）。在小說中主要的創傷敘述進行前，《寵兒》鋪陳了一段柴特的創傷記憶被喚起的情節。情節中柴特的記憶被喚起的過程的確是出乎她意料，處於非自主的狀態。

她[柴特]對巴格勒的記憶很快就變模糊了。郝華德好歹還有一個叫人難忘的頭形。至於其他的，她就儘量忘掉以策安全。遺憾的是，她的腦筋迂迴難料。比如，她匆匆穿越一片田野，幾乎是用跑的，就為了迅速趕到抽水機那裡，洗掉腿上的西洋甘菊液。她的腦海中什麼也沒有。那些男人來吃她奶水的影像，正如她背部的神經一般了無生機……。接著某件事在腦海中浮現。……猛然間，「甜蜜之家」一幕幕浮現在她眼前；雖然那塊田地上的每片葉子在在讓她想要大聲尖叫，它卻一一展現在她眼前」。（8）

柴特以為自己能夠遺忘令她感到痛苦的創傷記憶，然而記憶並沒有被遺忘，它只是被抑制在無意識，等待類似的事物或場景將其引發至意識中。當柴特記憶中屬於「甜蜜之家」的創傷經驗無預警地被引發後，「『甜

蜜之家』碩果僅存的男人」(8)保羅四也隨之出現在一二四號的門廊上。小說接下來的情節就是柴特與保羅四對彼此經歷的詢問以及整個創傷敘述的展開。

2. 主題模糊，周遭清晰

前文曾經提到，受創者的創傷敘述會有所保留，不會直接碰觸創傷記憶的核心。所以在創傷敘述中，受創者會避開創傷記憶的核心，間接地繞著創傷經驗的周圍記憶打轉。這種間接的敘述方式構成了創傷敘述中另一種特色：對記憶採取環繞式的敘述風格。受創者會一直敘述創傷記憶中次要、甚至是無關緊要的事物，卻不直接敘述創傷記憶的關鍵場景。在《寵兒》中，柴特最早回想起有關「甜蜜之家」的記憶不是她被鞭打或奶水被搶走的經過，而是「甜蜜之家」美麗的梧桐樹。「她覺得難為情——居然想起沙沙作響的美妙樹木而不是兩個兒子。她再怎麼試，每一次梧桐都擊敗她的兒子；她因而無法原諒自己的記憶」(8)。當柴特回憶她與寵兒的過去，她想起的不是在柴房裡鋸斷寵兒喉嚨的那一幕，而是她為寵兒設的墓碑，以及為了在墓碑上刻字而與雕刻師性交的經過。柴特清楚地描述「尚未刻字的墓石涼意沁人；那一塊，她挑出來墊著腳靠上去，膝蓋像墓穴一樣敞開著，墓石粉紅如指甲，周圍撒著閃亮的屑片」(6)。

保羅四的創傷敘述也是如此。他難以說明自己在「甜蜜之家」受創的感覺，只好對柴特敘述他在受虐時看到的一隻公雞的樣子，那是一隻名叫「先生」的公雞。「『先生』看起來那麼……自由。比我好，比我健壯、強硬。那隻他媽的小雞當初自己連殼都掙不開來，卻仍然是個國王，而我……」(87)。保羅四以「先生」的自由與強壯對比自己在受創時的痛苦與無助。另一個例子是當史坦普·培德試著對保羅四敘述寵兒被殺的真相時，他無法說出柴特是如何將她的小孩聚在一塊，帶到柴房，然後企圖將他們一個個殺掉。他只能對保羅四詳細描述他費盡心思去採來的黑莓有多麼珍貴，以及寶貝薩格斯為寵兒舉辦的宴會有多麼豐盛(187-188)。

在《寵兒》中，此種敘述風格最明顯的例子是當保羅四詢問柴特有

關寵兒死亡的真相時，柴特的敘述開始繞著殺嬰事件的周圍打轉。她談到寵兒會爬與長牙的經過，提到因為沒有人教她，所以她不知如何照顧已經長牙的寵兒，柴特甚至詳細敘述一塊布的花樣，那是一塊她想用來作寵兒內衣的印花布。她談論著許多與寵兒有關的事物，卻一直無法直接敘述到底寵兒死亡的真相為何。值得注意的是，當柴特回答保羅四的詢問時，她在屋內繞圈子的動作與她環繞式的敘述一模一樣：

她在轉圈子，在屋裡一圈又一圈地繞著，繞過果醬櫥、窗戶、前門、另一扇窗、餐具櫥、起居室門、乾燥的水槽、爐子——再繞回果醬櫥。保羅四坐在餐桌旁，看著她轉到眼前，又轉到背後，像一副緩慢而穩定的車輪一般。她時而把手抱在背後，時而摀著耳朵、捂著嘴或手臂在胸前交叉著；偶爾一邊轉動，一邊揉著屁股，但車輪從未停歇下來。(191)

柴特的動作具體化了她對創傷記憶的環繞式敘述，此種敘述模式讓身為聽眾的保羅四摸不著頭緒，「他給弄得頭暈目眩，起初他以為是她轉個不停的緣故，像是繞著話題轉那樣繞著他兜圈子。一圈又一圈，方向一成不變，否則他的頭就不會那麼暈了……他只聽到隻言片語——那倒沒關係，因為她還沒有講到重點，還沒回答他的問題」(192-193)。保羅四不知道柴特並不會提到重點，也不打算回答他的問題。她的敘述與肢體動作同時都在打轉，是因為她無法直接說出創傷記憶的核心。「轉啊，轉啊，現在她又嚼著別的事情，而不談論要點」(194)。劉亮雅認為柴特的敘述與動作說明了此種「破碎、迴繞的敘述呈現前黑奴受創的心理現實」(177)。里休(Lorraine Liscio)認為「柴特的繞圈動作證明了她無力說明此瘋狂且嚇人舉動的前因後果」(38)。史密斯(Valerie Smith)則指出小說中的敘述會繞著主題打轉，主要是因為創傷記憶的敘述與實際的受創經驗之間有著無法跨越的空間(350)。對於此種無法直接敘述創傷記憶核心的情況，柴特自己其實也很清楚，因為「柴特知道，她在房間、他和話題周圍所繞的圈子會保持一致的，誰非要問不可的話，她都永遠無法直接了當、開門見山地談。要是他們沒有馬上瞭解的話，她也永遠

無法解釋」(195)。

不只小說中的人物無法說出創傷記憶的核心，小說本身的敘述也無法將創傷形成的關鍵場景交代清楚。《寵兒》整個故事的核心是柴特殺嬰的事件，但小說中真正敘述這個事件的篇幅卻很短，只有短短的六頁。¹¹而且事件的敘述者也不是柴特，而是小說中第三人稱的敘述者。敘述者以全知的觀點對事件做類似實況轉播的敘述。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第三人稱的敘述也沒有呈現柴特殺死寵兒的鏡頭，因為敘述者的鏡頭一開始是跟著「學校老師」等四個白人移動。敘述者詳細描述白人們如何朝向一二四號悄悄前進，等敘述者的鏡頭跟著白人到了柴房，柴特殺死寵兒的關鍵場景已經結束了。「在柴房內，兩名男孩流著血躺在一名女黑鬼腳下的鋸木屑和穢物裡，那女黑鬼用一隻手將一名血淋淋的孩子摟在胸前，另一隻手抓著一個嬰兒的腳跟」(180)。整部小說，從頭到尾，讀者都沒有清楚聽到（經由受創者的敘述）或看到（經由第三人稱敘述者的鏡頭）創傷形成的關鍵場景。這個場景，同時也是創傷記憶的核心，在小說中被所有敘述者遺漏，成為永遠的空缺（absence），此空缺標誌了創傷記憶中不可言說的部份，也讓《寵兒》的敘述更貼近創傷敘述的形式與創傷的本質。小說的敘述凸顯這個空缺並加大了讀者的想像空間，讀者無法看到或聽到柴特殺死寵兒的經過，只能被迫自行想像。然而使讀者運用想像力填滿這個空缺，卻比小說清楚呈現整個事件發生的始末更為有用，因為經由想像力的擴展，讀者在自我的想像中更能體會在創傷形成的關鍵場景中，受創者曾經承受卻無法以言語再現的恐怖與無力感。

除此之外，小說中敘述的時間性也符合創傷敘述的特性。首先是敘述開始的時間點。《寵兒》的敘述開始於柴特殺嬰事件發生後的第十八年。故事一開始就敘述柴特與丹佛在一棟鬧鬼的房屋中生活，「一二四號帶有怨氣，瀰漫著一名嬰孩的怨恨」(5)。讀者必須藉由書中人物的回憶與彼此的對話才能重組並還原出過去發生的事件，而且要到小說的敘述進行到一半時，讀者才會發現原來糾纏著柴特一家人的創傷記憶是有關

¹¹ 這裡的頁數是指《寵兒》中譯本的179-184頁。

柴特殺死寵兒的往事，而一開始住在一二四號的鬼魂原來就是後來化為人形的寵兒。小說採倒敘的方式鋪陳情節正符合創傷具有的「後遺性」。如前文所述，創傷是後遺地被賦予意義，必須在時間中醞釀才能成形，所以唯有將敘述的起點往後移動，以倒敘的方式呈現受創者對創傷事件的回憶，讀者才能看出創傷事件如何影響受創者日後的生活以及它在受創者的一生中可能佔據的重要位置。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因為創傷是後遺地被賦予意義，所以受創者也可能以現在的生活經驗重新定義以前發生的創傷事件，進而賦予創傷新的意義，甚至對創傷經驗釋懷。在小說中，柴特始終不知道她的丈夫黑利（Halle）為何在他們逃離「甜蜜之家」的那個夜晚沒有出現在約定的地點；她認為黑利的失約是他們逃亡計畫失敗的主因，並對此耿耿於懷，直到保羅四來到一二四號，告訴她事情的真相，柴特才放下心中對黑利的怨懟（81-83）。

《寵兒》的故事情節，如同創傷敘述，是後遺地重塑過去的記憶。小說的敘述不斷地在現實與記憶中來回，再加上創傷敘述所特有的敘述空缺，使得整部小說的敘述充滿破碎與斷裂。此種破碎、非線性的倒敘正是創傷敘述在時間性上的特色。創傷敘述不像一般記憶的敘述是「言語上的線性敘述」（Herman 37）。赫許（Joshua Hirsch）指出，創傷敘述並不存在線性的時間觀。在創傷敘述中，「時間變得碎裂且不受控制。過去不是變得太遠就是太近，記憶不是遙不可及（失憶）就是不請自來，突然出現在意識中（高度記憶）」（103）。小說在逐漸開展的情節中夾雜著大量破碎、不連貫的倒敘，好比受創者在受創後的生活：一方面進行著現在的生活，一方面卻被過去破碎的痛苦記憶纏繞著。在柴特的生活中，有關寶貝薩格斯、寵兒、黑利、「學校老師」、迦諾太太（Mrs. Garner）等的破碎記憶不斷地交替出現，它們夾雜在柴特的生活中不肯離去。

3. 創傷敘述的語言符號

《寵兒》中的創傷敘述除了上述的特色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說本身與書中人物所使用的語言符號，這些符號像詩的語言一般充滿凝縮、象徵與替代的特性。佛洛伊德認為「回到意識中的被抑制物不可能是流暢且未經改變的；它被扭曲是因為對意識抑制的反抗所造成，也可

能是受喚起它的力量所影響」(1939: 95), 拉普朗虛與彭大歷斯也提到「被抑制物復返是透過移置、凝縮、轉換等而運作」(456)。對於被抑制的創傷記憶, 受創者因為不想說或說不清楚, 所以在創傷敘述的過程中會轉而使用充滿象徵性的語言符號, 以隱喻 (metaphor) 或轉喻 (metonymy) 的方式概括地描述創傷事件。¹² 這些象徵性的語言使得小說本身充滿豐富的意象, 也使讀者更能體會小說人物無法說出的受創感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柴特背上的那棵野櫻桃樹。柴特用「樹」的意象成功地再現她背上被鞭打的痕跡：

「你背上有什麼樹？有什麼東西長在你背上嗎？我看不出來有什麼東西長在你背上。」

「它還是在那裡呢。」

「誰告訴你的？」

「那個白人姑娘。她就是這麼說的。我從未見過，永遠也不會見到，但她說它看起來就是那樣，一顆野櫻桃樹、樹幹、樹枝，還有樹葉。小小的野櫻桃樹葉。但那是十八年以前的事。現在或許都長出櫻桃來了。」(21)

被鞭打的痕跡像樹枝一般縱橫交錯地伸展在柴特的背上，也象徵柴特被奴隸主人鞭打所造成的創傷始終存在於她心中。柴特對保羅四敘述她違逆人倫，做了殺死自己小孩的決定，是因為當她認出了學校老師的帽子時，「小蜂鳥將針嘴直接穿透她的頭巾，紮進了頭髮，拍著翅膀。如果說她在想什麼，那就是不。不，不不，不不不。很簡單」(195)。柴特用被蜂鳥的針嘴刺進腦袋來形容她在受創時失去理智，頭腦一片空白的景況。保羅四說他把無法告人的創傷記憶藏在「生鏽的煙草罐」(87)。

¹² 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文中提到夢工 (dream-work) 以「凝縮」(condensation) 或「替代」(displacement) 的方式將潛藏的慾望轉化為夢的內容 (dream-content) (1900: 277-309), 拉岡 (Jacques Lacan) 則進一步以語言結構解釋「凝縮」就等於語言結構中的「隱喻」, 而「替代」則是「轉喻」(160)。受創者的創傷敘述與夢的內容都是被抑制物復返的呈現, 所以創傷敘述的內容同樣充滿對創傷記憶的隱喻或轉喻式處理。

煙草罐代表的是儲存創傷記憶的無意識空間。除此之外，小說本身也充滿具象徵意味的符號。柴特不惜一切代價要逃離的「甜蜜之家」，本身就具有隱藏的含意，因為家是人類記憶的起源，「甜蜜之家」代表了《寵兒》中一切記憶的根源。只不過對柴特與保羅四而言，屬於「甜蜜之家」的記憶一點也不甜蜜，相反地，這些記憶卻是所有苦難的源頭。

寵兒的名字也是個難解的符號。首先，她的身份難以被確認；讀者無法從小說中的敘述確定寵兒到底是小女嬰的鬼魂化做人形復返，還是她只是個逃跑的女黑奴，「曾經被某位白人關起來，不讓她出門，以逞其私慾」（144）。其次，寵兒在小說中象徵的意義也很複雜，她既是受創者又代表創傷自身。做為受創者，寵兒既代表個人的創傷也代表黑人的集體創傷。¹³ 做為創傷，寵兒代表著柴特與丹佛的創傷記憶的核心，劉亮雅指出「在象徵層次上，摯愛[寵兒]乃是被壓抑、卻又壓抑不了的過去，它要求被承認、面對」（169）。¹⁴ 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認為「寵兒代表的意義比書中任何一個角色想的還要多……。她是揭露真相與自我啟示的催化劑」（35）。寵兒難以界定的身份與她所代表的多重意義，使得小說中的創傷敘述變得更為複雜。

創傷敘述與創傷治療

創傷敘述不想說、又說不清楚的特性使受創者對創傷敘述始終抱持逃避的態度。對受創者而言，創傷敘述是被動而非主動的行為，除非受外在因素（譬如非自主性記憶的引發或他人的詢問）的影響，否則受創者不會主動敘述與創傷有關的記憶；他們寧願將創傷記憶抑制在無意識中，以為它會就此被遺忘。然而創傷並不會被遺忘，卡露絲指出受創者「會像著了魔似的被一個影像或事件纏繞」；不斷地復返並侵入受創者的生活是創傷記憶的特性（3）。小說中柴特不希望丹佛接觸一二四號以外

¹³ 小說中屬於寵兒獨白的章節涵蓋了黑人被白人從非洲強行載運到美洲為奴的歷史。在寵兒的獨白中，她化身為奴隸船上的一名女黑奴。在販奴航程中她與許多黑人被迫擠在狹小的船艙裡；因為缺乏糧食和飲水，她只能看著身邊的人逐漸死去。何文敬認為「摩里森筆下的寵兒不僅是柴特的愛女，其鬼魂也代表奴隸制度下的所有犧牲者」（251）。

¹⁴ 劉亮雅將Beloved的中文名字翻譯為「摯愛」。

的世界，就是因為她相信自己經歷過的創傷經驗還有可能再度發生在她的小孩身上。柴特對丹佛說：

哪天你走在路上，聽到或看到某件事發生，一清二楚。而你以為那是你自己想出來的，是想像的畫面。可是不然。那是你碰上別人重現的記憶。我來這兒以前所待過的地方，那個地點是千真萬確的，永遠不會消失。即使整個農莊——它的一草一木都死光了，那畫面依然存在；更要命的是，如果你去那裡——你從來沒去過——要是你去那裡，站在它存在的地點，它會再發生；它會在那兒等著你。所以，丹佛，你永遠不能去那兒，永遠不能。因為縱使一切都過去了——過去了並結束了——它總是會在那裡等著你。(44)

保羅四來到一二四號後，柴特開始感到對新生活的渴望；「與他[保羅四]共享未來，還是過著沒有他的未來，這念頭開始撩撥她[柴特]的心」(51-52)。柴特為了與保羅四共度新的生活，選擇停止哀悼過去的創傷。此外，保羅四趕走原本居住在一二四號的鬼魂，就等於是受創者想將創傷記憶逐出意識之外的行為。然而，小說中的人物企圖遺忘創傷記憶的舉動被證明是失敗的，因為被保羅四趕走的寵兒只消失了幾天，就化做人形重返一二四號。這證明了創傷記憶並沒有辦法被主動地遺忘，在受創者意想不到的時間與地點，被抑制的創傷記憶還是會突然地出現，回到受創者的眼前。

創傷記憶無法被消極地遺忘，所以臨床的精神治療醫師或心理諮商工作者選擇積極的治療方式：誘發被抑制的創傷記憶，並鼓勵受創者將創傷經驗的細節說出來。如此的理論根據來自佛洛伊德對歇斯底里症病人的觀察——佛洛伊德發現當病人將被抑制的記憶以帶有感情且詳盡的方式說出後，原先困擾著他們的歇斯底里症狀就消失了(1895: 6)。佛洛伊德的看法奠定了現代精神治療對「談話治療」(talking cure)的信賴。談話治療需要一個與創傷經驗無關的第三者做為聽眾，其角色通常由精神治療醫師扮演，「治療師扮演見證者與盟友的角色，他／她的存在能幫

助受創者說出不可說的故事」(Herman 175)。小說中柴特與保羅四彼此的創傷敘述就類似談話治療，其過程雖然緩慢，卻會隨著彼此的信賴關係逐漸建立而有所進展。

此外，小說中還有另外一種創傷敘述：受創者與創傷自身的對話（其實就是柴特與寵兒之間的對話）。¹⁵ 此種創傷敘述不但沒有治療的效果，反而會使受創者再度陷入創傷情境中無法自拔。小說剛開始時，在寶貝薩格斯過世後，柴特與丹佛就打算與創傷協商，她們「決定召喚出百般折磨她們的鬼魂，以結束這場迫害。她們想，也許來一次交談、意見交換或什麼的會有用」（6）。柴特還說：「要是她現身的話，我就會跟她說個清楚」（6）。但是小女嬰的鬼魂並沒有出現，這說明受創者想自行與創傷協商的意圖難以成功。此外，當寵兒來到一二四號後，她的種種行為使柴特相信——寵兒就是十八年前被她殺死的小女嬰；原本打算遺忘過去的柴特選擇重新擁抱寵兒所代表的創傷，她對保羅四強調她殺死寵兒並沒有錯，因為柴特相信「我[柴特]止住了他[學校老師]……我把我的寶貝們帶到了安全的處所」（195）。保羅四無法認同柴特的論點而搬離一二四號（這意味著談話治療的中止），而柴特本人也被寵兒所代表的創傷吞沒。她再一次試圖與創傷（寵兒）溝通，結果又是無功而返。柴特一直想對寵兒說明她殺死寵兒的理由，「柴特懇求原諒，一再數著、羅列出她的原因：說寵兒對她而言比她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更有意義；說她隨時都願意交換位置，願意放棄自己的生命……只為換回寵兒的一滴眼淚」（287）。寵兒對柴特的說詞無法理解也不想去理解，她只是一味地要求柴特付出精力照顧她，「寵兒就像舔奶油一般貪著要她獻身」（289）。柴特越來越瘦，她「手背虎口的肉薄得像中國絲一般，房子裡的衣裳她穿起來都太大了」（285）；寵兒卻「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豐滿」（285）。小說中的情節說明受創者無法與自身的創傷溝通，他們無法藉由自我與創傷的對話來消弭創傷。缺乏聽眾的創傷敘述只會使創傷造成的痛楚增大，而被巨大創傷壓迫的受創者則愈趨渺小，缺乏掌控生活的自信與力量。柴特與創傷（寵兒）之間的對話無法使創傷癒合，即使是

¹⁵ 前文提到，小說中寵兒的意義複雜難解，既是受創者又代表創傷自身。以對話的內容而言，柴特與寵兒的對話可以視為是受創者試圖與創傷自身溝通的過程。

有他者做為聽眾的談話治療也不能使創傷完全癒合，赫曼指出，儘管受創者與治療師都希望有神奇的轉變，然而「敘述創傷故事的目的是整合創傷的經驗，而非驅魔般地驅逐創傷」（181）。

創傷敘述無法治癒創傷，它只是幫助受創者走出創傷的必經階段之一。赫曼認為創傷治療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營造出使受創者覺得有安全感的環境；誘導受創者說出創傷記憶則是第二階段（155）。藉由敘述創傷記憶，受創者可以正視並重新掌握過去的創傷經驗。在探討快感原則的運作與創傷之間的關係時，佛洛伊德指出受創者在經歷創傷後會有「重複強制」的行為：受創者會重複地在夢裡或想像中使自己重新置身在創傷發生的場景中（Freud 1920: 13）。矛盾的是，重複強制的行為與追求心理恆定狀態的快感原則相違背。對此，佛洛伊德解釋為：受創者重複強制的行為具有「本能的特徵」（instinctual character）（1920: 35），它超越（beyond）了快感原則，因為它「更原始、更基本、更出於本能」（1920: 23）。佛洛伊德將重複強制與「生物固有的想回到原初狀態的衝動」（1920: 36）相連結，以此說明受創者利用重複強制的行為試圖理解創傷發生的原因，並主動掌握創傷、進而自創傷中脫困，恢復受創之前的正常生活。在重複強制的行為中，受創者企圖重建並掌控創傷的本能與創傷敘述的功能相類似。創傷敘述的重要性不是試圖與已經固著的創傷對話，而是藉由敘述創傷記憶，幫助受創者在敘述的過程中重建創傷場景。創傷敘述協助受創者正視創傷並瞭解創傷對他／她的生活有何影響後，創傷治療才會進入第三階段：重新建立與他者及日常生活的聯繫（Herman 155）。

小說中柴特經歷了上述創傷治療的三個階段：首先，一二四號是柴特認為能使她覺得安全無虞之處，她將自己與寵兒孤立在一二四號的空間內，隔絕外在的世界與可能再度發生的創傷。其次，當保羅四出現後，柴特開始她的創傷敘述；如前文所述，柴特與保羅四彼此間的傾訴有治療的效果，與寵兒進行的對話則反而使她被創傷吞沒。最後，在寵兒最終消失的場景中，柴特重新經歷與創傷經驗相類似的場景，並藉著他者的善意走出創傷的陰影。在這個關鍵場景中，愛德華·鮑德溫（Edward Baldwin）駕著馬車要到一二四號接丹佛去工作。對柴特而言，這與她經

歷過的創傷經驗相類似：十八年前，「學校老師」帶著一群白人闖入一二四號，想強行帶走柴特與她的孩子們。已經深陷在創傷中的柴特分不清她眼前發生的是類似的場景還是真的創傷重演——兩者相似之處（白人來到一二四號帶走柴特的小孩）使柴特以為創傷要重演而陷入「復仇式的幻想」(revenge fantasy) (Herman 189)。赫曼指出受創者會有復仇式的幻想，在幻想中施暴者與受創者的角色互換，受創者以報復的方式擊敗施暴者，並以此擺脫創傷的痛苦與屈辱。然而，此種幻想無法使創傷癒合，反而「加劇受創者的恐怖感受，並貶低她的自我價值」(189)。在小說中，已經陷入幻想狀態的柴特瘋狂地分不清誰是誰，「她看見了他。牽著一匹母馬，放慢了步伐，戴著一頂大黑帽，寬寬的帽沿遮住了他的面孔，卻遮不住他的來意」(310)。柴特將鮑德溫先生誤認為「學校老師」並衝向馬車想殺了他，幸好在一旁的丹佛阻止了柴特錯誤的復仇舉動。丹佛，一二四號的另一個受創者，眼見她母親試圖與創傷（寵兒）對話卻反被創傷掌控而失去自我。這促使她決定比柴特更早走出一二四號。蕾娣·瓊絲(Lady Jones)與其他黑人的關懷使丹佛與外在世界有了聯繫。這些來自他者的善意協助丹佛走出創傷，決定過新的生活。與外界的重新接觸賦予丹佛自信與力量，也使她在關鍵的時刻有能力阻止柴特的復仇舉動，使創傷不至於真正重演，否則等柴特清醒後她會發現自己製造了另一個創傷（因為她恩將仇報，誤殺了前來幫助她們的鮑德溫先生）。

結語

在小說的最後，寵兒消失於一二四號門前，柴特與丹佛也展開新的生活。保羅四回到一二四號並帶給柴特新的希望。他告訴柴特：「我們擁有的昨天比誰都多。我們需要某種明天」(325)。然而寵兒並沒有完全消失，「一二四號後面的小溪邊，她的腳印來了又去，去了又來。腳印多麼熟悉。即使是小孩或者是大人把腳放進去，也都會合適的」(328)。事實上，創傷需要治療，但它永遠也無法癒合。赫曼指出「創傷無法真正解脫，受創者也無法完全復原」(211)。如前文所述，創傷敘述無法治癒創傷。它只能幫助受創者重建創傷的場景，將過去受創的歷史統合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中，使受創者不再生活於孤立無援的世界，如同柴特與丹佛

只活在一二四號裡的世界一樣。創傷敘述最終的目的是使受創者如同丹佛一般走出來尋求他者的協助，進而建立新的自我價值。在《寵兒》中，摩里森成功地運用不同的敘述策略來模擬創傷記憶的再現過程。她運用創傷敘述的特性，將原本不可說的創傷記憶化為一則動人的故事。小說中的創傷敘述使讀者貼近受創者的感受，同時也使讀者瞭解創傷的本質與走出創傷的可能。

引用書目

- Angelo, Bonnie. "The Pain of Being Black." *Time* 22 May 1989: 48-50.
- Atwood, Margaret. "Beloved." *Toni Morri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Eds.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K. A. Appiah. New York: Amistad, 1993. 32-35.
- Bouson, J. Brooks. *Quiet as It's Kept: Shame, Trauma and Race in the Novel of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 Bell, Bernard W. *The Afro-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7.
- Benjamin, Walter. "On the Image of Proust."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1927-1934*. Eds. Michael W. Jennings, Howard Eiland, and Gary Smith. Tr. Harry Zohn. Cambridge: Belknap, 1999. 237-247.
- Caruth, Cathy. "Introduction." *American Imago* 48.1 (1991): 1-12.
- . "Introduction." *American Imago* 48.4 (1991): 417-424.
- Freud, Sigmund. "Studies on Hysteria." 1895.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abbreviated as *SE* hereafter). Vol. 2. Trs. and eds. James Strachey, et al. London: Hogarth, 1955. 3-305.
- .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00. *SE*4. 1-338.
- .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0. *SE*18. 7-64.
- . "Moses and Monotheism: Three Essays." 1939. *SE*23. 7-137.
- Hansen, Miriam. "Benjamin, Cinema, and Experience: 'The Blue Flower in the Land of Technology'." *New German Critique* 40 (1987): 179-224.
- Herman, Judith Lewis.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1992.
- Hirsch, Joshua. "Post-Traumatic Cinema and the Holocaust Documentary." *Trauma and Cinema: 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93-110.
- Janet, Pierre. *Psychological Healing*. Trs. E. Paul and C. Paul.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Lacan, Jacques. *Écrits: A Selection*. Tr.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Liscio, Lorraine. "Beloved's Narrative: Writing Mother's Milk."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11.1 (1992): 31-46.

Morrison, Toni. "Rediscovering the Black Histor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1 Aug. 1974: 14-20.

Morgenstern, Naomi. "Mother's Milk and Sister's Blood: Trauma and the Neoslave Narrative."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8.2 (1996): 101-126.

Prager, Jeffrey. *Presenting the Past: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Misremember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mith, Valerie. "'Circling the Subject': History and Narrative in *Beloved*." *Toni Morri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Eds.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K. A. Appiah. New York: Amistad, 1993. 324-355.

Spargo, R. Clifton. "Trauma and the Specters of Enslavement in Morrison's *Beloved*." *Mosaic* 35.1 (2002): 113-131.

拉普朗虛 (J. Laplanche)、彭大歷斯 (J. B. Pontalis) 編。《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台北：行人出版社，2001。

摩里森 (Toni Morrison)。《寵兒》。何文敬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

劉亮雅。〈面對奴隸制度的鬼魂：東妮·莫莉森的《摯愛》中的重新記憶政治〉。《中外文學》。30.11 (2002)：157-184。